



《王充闾回想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为当代散文大家、文化学者、诗人王充闾先生的新作。作者以特有的散文笔法展开回忆,讲述文学写作及那些过去的事情。

隐心

“被劈成两半”的“诗仙”

仕途之外,也还有隐逸一途。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取向,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体悟人生的真谛,致致精神的慰藉,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还有些人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擦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这就是所谓“隐心”。隐心的痛苦程度,往往超过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物质匮乏,需要战胜富贵的诱惑,勇于面对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的殷殷劝进的无止不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炫耀,需要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

在封建时代,即使是归隐山林,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风险。出于内外种种原因,历代取径“出世”的人为数并不很多;绝大部分读书士子,终其一生,还是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飘逸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卷入仕途、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困顿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内心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煎熬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煎熬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

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于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途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诗仙”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握魏阙、居高位、掌权枢,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而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一生中,他只有两次从政经历,都以惨败告终:前一次,被以“文学弄臣”蓄之,即使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只好“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后一次,竟然招致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以叛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归根结底,他只是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稳登仕进者也数不胜数。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混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那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

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见表上书,锐身自荐,而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李白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虔诚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置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缘木求鱼!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脱离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高远的视点,广阔的襟怀、超拔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子为诗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加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身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巨大的遗憾、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当那些过往渐渐消散一如繁华之落幕,谁还记得幕布之后的挣扎与嘶吼?委顿苍白取代了胭脂胜雪,历史也便成为简帛之中只言片语的冰冷叙述。

弱水之畔昆仑之巅

民丰的先天优势,比之河西其他地区更为肥沃富庶。民国诗人罗家伦游览张掖后写出名句“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张掖因此得了一个“塞上江南”的美称。

八千年历史看甘肃,甘肃历史看河西,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要看河西走廊的历史还得从祁连山这座母亲山说起。

“祁连”二字由匈奴语音译而来,是“天”或“天神”的意思。据《山海经》记载,西北一带在上古和远古时期称为大荒以西,这里生活着犬戎一族,犬戎族长着犬类的形体却有人类的面貌。不论是来自想象,还是人们基于对少数民族的偏见,那个时期即便的确有这样一种半人半兽的物种存在,也只是在间接说明西北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属于少数民族活动区域,人们依山傍水聚居生活,因此才滋生出了最早的游牧文明。祁连山是西北地区的母亲山,几大河流发源于此,她养育了这里的万物生灵,所以在当地人的语言和认知当中,祁连山一直是神圣不可仰望的圣地,与“天”一样神秘又崇高。

其实,在这条山脉得到“祁连”这个名字之前,她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昆仑之丘。关于昆仑之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和猜测,至今还是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以及网络游戏中首选的地域。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是神话传说中万仙来朝、万世先贤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人们熟知的西王母和瑶池仙界的

故事就发源于昆仑。西王母是存在于神话中最早的神祇之一,关于她的传说远远早于三皇五帝,先于她的传说远远早于五十年文明,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或许再找不出与之比肩的早期神话人物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文明是发源于西北,然后自西北东流传到了中原。

河西走廊的传说很多,有些见于诸古籍文献当中,有些却流传在民间,经过一代代人口耳相传保留下来。有文献记载且得到证实,或者说大众普遍接受的我们称之为“历史”,没有确凿证明但也同样被大众认可的便是“故事”了。而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里,先民们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原理,理解不了的自然而然,以及对物候演变规律无法推理的事物,便只能通过假设和想象来说明,由此就生出了“神”的理念,“神话”故事也便因此广为流传。

华夏文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年代距今五千余年,但是人类文明远不止五千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五千年前的人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哪里发源,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才得以传承呢?不知道!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史学家们说在那之前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所以没有留下可供考据的记载,甚至将五千年前的历史统称为“蛮荒”。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尽然。“蛮荒”并不完全是一片空白,那些神话传说为我们研究和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与“被劈成两半”的“诗仙”李白相对映,状元杨慎则是一生中“冰火两重天”。我曾以《风波中的彻悟》为题,剖析了这一场更为典型的人生惨剧。

杨慎字升庵,出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可说是飞黄腾达、春风得意。

当时的皇帝明宗崇祿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问题。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承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续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成规,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宗支,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帝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璠等主张遵从本意,称孝宗为皇伯;而内閣派杨廷和、杨慎父子 and 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断然固执己见,廷和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有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闹事

最凶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奄奄一息;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关于这场轰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他将生父“升附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勇为’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当代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至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世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的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途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可是,却时时刻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他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致使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他也享受不到。年满七十后,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故里,巡抚察鞫,立刻勒令“速还”。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化为乌有,由宰辅的峰巅跌入囚徒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他以沉重打击、身心折磨的同时,却使他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解脱、实现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得了“达生之道”,认识到瞬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原需奉行“齐物哲

学”等闲地看待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调整视角,则对人世间万事尽可驰张莫拘、淡然处之。

杨慎在晚年创作的《二十二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悟。其中有一段开场词,调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居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里面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含。且看《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得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乱换秋。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际遇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本文摘自《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



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想要冷落甚至遗忘一方天地,总是无情且残酷的,不管那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繁盛。水天一色抑或沃野千里,马蹄没草还是人声鼎沸。当那些过往渐渐消散一如繁华之落幕,谁还记得幕布之后的挣扎与嘶吼?委顿苍白取代了胭脂胜雪,历史也便成为简帛之中只言片语的冰冷叙述,若要重温就好比是隔着层层面纱去窥探佳人真容般朦胧,刚有了一点眉目倏忽间又是雾锁烟迷,像萦绕祁连山顶的晨雾霜露,又如洒洒而去的黑河水流,无语静默的迷雾中令人思而不得,常有云深不知处的困惑。

巍巍祁连山,苍茫天地间。这条终年白雪皑皑伸至巍峨的山脉,为大西北增添了无数传奇,滋养着万物生发延续,也赋予了西北大山一样的沉稳与敦厚。祁连山脚下的张掖市,是一座拥有五县一区、人口128万、按照当今时兴的叫法归类在六线之外的城市。据说在古代,张掖曾是今天的北上广一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线大都市。是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国家命脉、江山咽喉。这一切都得益于祁连山的慷慨馈赠,祁连山为这片土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和适宜聚居的生态环境。

张掖因为背靠祁连山、侧倚黑水河而得天独厚,成为名副其实的依山傍水之地,也因此占尽了物阜

民丰的先天优势,比之河西其他地区更为肥沃富庶。民国诗人罗家伦游览张掖后写出名句“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张掖因此得了一个“塞上江南”的美称。

八千年历史看甘肃,甘肃历史看河西,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要看河西走廊的历史还得从祁连山这座母亲山说起。

“祁连”二字由匈奴语音译而来,是“天”或“天神”的意思。据《山海经》记载,西北一带在上古和远古时期称为大荒以西,这里生活着犬戎一族,犬戎族长着犬类的形体却有人类的面貌。不论是来自想象,还是人们基于对少数民族的偏见,那个时期即便的确有这样一种半人半兽的物种存在,也只是在间接说明西北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属于少数民族活动区域,人们依山傍水聚居生活,因此才滋生出了最早的游牧文明。祁连山是西北地区的母亲山,几大河流发源于此,她养育了这里的万物生灵,所以在当地人的语言和认知当中,祁连山一直是神圣不可仰望的圣地,与“天”一样神秘又崇高。

其实,在这条山脉得到“祁连”这个名字之前,她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昆仑之丘。关于昆仑之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和猜测,至今还是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以及网络游戏中首选的地域。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是神话传说中万仙来朝、万世先贤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人们熟知的西王母和瑶池仙界的

故事就发源于昆仑。西王母是存在于神话中最早的神祇之一,关于她的传说远远早于三皇五帝,先于她的传说远远早于五十年文明,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或许再找不出与之比肩的早期神话人物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文明是发源于西北,然后自西北东流传到了中原。

河西走廊的传说很多,有些见于诸古籍文献当中,有些却流传在民间,经过一代代人耳相传保留下来。有文献记载且得到证实,或者说大众普遍接受的我们称之为“历史”,没有确凿证明但也同样被大众认可的便是“故事”了。而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里,先民们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原理,理解不了的自然而然,以及对物候演变规律无法推理的事物,便只能通过假设和想象来说明,由此就生出了“神”的理念,“神话”故事也便因此广为流传。

华夏文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年代距今五千余年,但是人类文明远不止五千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五千年前的人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哪里发源,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才得以传承呢?不知道!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史学家们说在那之前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所以没有留下可供考据的记载,甚至将五千年前的历史统称为“蛮荒”。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尽然。“蛮荒”并不完全是一片空白,那些神话传说为我们研究和

探索历史提供了很多借鉴与佐证,虽然不能作为真实的史料去看,但从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

随着人们对人类文明起源的不断探索发现,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当作“野史”来看待的,譬如西方人,就从他们的神话故事里追溯到了一部分史实,且被不断证实。当然,很多人还是觉得神话故事只是传说,不足信,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可否认,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把神话传说当作历史来理解的,这一点在《山海经》中有所体现。这部奇书中收录记载的那些奇幻故事与古中国的山川地理和风貌民俗与现在的地貌、地名有着极大的相对应的关联,应该按之作考地地理书籍更符合事实。而且细读古籍发现,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后来有文字的历史记载,都在佐证一个事实,那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最早起于西北。

在《山海经》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地名——昆仑。与之相伴的是西王母的一系列故事和传说,再到后来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炼石补天、黄帝轩辕氏求援昆仑、后羿求仙药,以及更迟的周穆王瑶池相会等传说,都无一不在说明,中国西北是华夏文明和古人类的发祥地。而昆仑这个地方,有着最早的人类生存。

昆仑到底在哪里?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昆仑山吗?答案是否定

的,古代的昆仑和现在的昆仑山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今天的祁连山,这在《山海经》中能够得到证实。《山海经》中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这个方位是从西次三经而来,西次三经中的第一座山叫崇吾山,在今青海茶卡盐湖附近,从茶卡盐湖往西南四百里是什么地方?而这里又说道“在河之南,北望家遂,南望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鄂渊”,指出了比较具体的方位点,根据信息再结合现今考证结果,我们框定了一个位置,便能得出结论,昆仑之丘是现在河西走廊一带的祁连山脉。

在称之为“上古”的时期,祁连山一带并不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样貌,而是草木茂盛、水泽连绵,适合万物生长繁衍的地方。西次三经中又说赤水、洋水出自昆仑,而黑水也源自昆仑之丘。我们都知,西北的黑河发源于南部祁连山区,从崑崙峡进入河西走廊,于张掖市城西北10千米附近,纳山丹河、洪河河流向西北,经临泽、高台汇集田园河,摆浪河穿越正义峡进入阿拉善平原。那么,便不难得出,昆仑之丘是今天的祁连山,这就为张掖掖的过往和演变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说到昆仑,不可避免要提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西王母。……葛洪《枕中书》记载,西王母是原始天王与大元玉女所生的天皇,而她则生了地皇,地皇生人皇,西王母便被当成女娲一样的造

人始祖。三皇的说法有很多种,得到普遍认可的分别指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黄帝。由此可见,西王母即便没有创世神的壮举,她的存在年代也远在黄帝之前非常久远的年代。

且不论西王母与黄帝还是周穆王之间那些几千年来都牵涉不清的关系孰真孰假,也不去计较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如何进化成了天上地下、四海八荒的第一绝色尊神的神秘过往,这座孕育万物的山脉是否仍然叫作“昆仑丘”都不影响我们对她的尊崇和仰视,也不影响我们找到上古和远古时期人类在这里活动的实证。尽管来源于神话志怪传说,但不可否认有着口碑相传的真实部分,神话传说具有的魅力和奇诡色彩是人们追溯生命起源的一种美好寄托,对历史的研究和文明的探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自然,也为我们记叙这座与河流山脉相依相伴的城市历史演变找到了更为翔实的一手资料。

张掖的名称得自后世,并不代表在那之前它就不存在,就像昆仑丘虽然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了,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亘古屹立于这里的事实,以及她千万年来不断孕育生命为我们得以延续而提供滋养的恩泽。

(本文摘自《张掖传:千年丝路八声甘州》,陈玉福等著,新星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